



八
精

忏悔与自赎

——
贰臣人格

张仲谋 著

插图本

中国传统文化人格丛书 李建中 主编

东方出版社

插图本

中国传统文化人格丛书

李建中 主编



忏悔与自赎

贰臣人格

张仲谋 著

东方出版社

责任编辑:陈来胜

装帧设计:张新勇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忏悔与自赎——贰臣人格/张仲谋 著. —北京:东方出版社,2009.12

ISBN 978-7-5060-3680-1

I. 忏… II. 张… III. 大臣-人格心理学-研究-中国 IV. D691.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83255 号

忏悔与自赎——贰臣人格

CHANHUI YU ZISHU ERCHEN RENGE

张仲谋 著

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

(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)

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: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 印张:12.5

字数:193 千字 印数:0,001—6,000 册

ISBN 978-7-5060-3680-1 定价:28.00 元

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

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(010)65250042 65289539

◎ 绪论：贰臣与中国的忏悔文学 /1

- 一、贰臣概念辩证 /3
- 二、贰臣与华夷之辨 /6
- 三、贰臣人格的两重性 /9
- 四、贰臣与中国的忏悔文学 /15

◎ 汉家名将，贰臣之祖——论李陵 /22

- 一、汉家名将 /22
- 二、北地岁月 /26
- 三、人格内涵 /30

◎ 南朝才子，北地羁臣——论庾信 /34

- 一、名父之子 /34
- 二、羁留北周 /37
- 三、受耻之树 /39
- 四、愧为李陵 /42
- 五、后代评价 /46

◎ 乱离人生，谨重贰臣——论颜之推 /51

- 一、出身名门 /51
- 二、大难不死 /53
- 三、再仕北齐 /55
- 四、忧患余生 /58

◎ 一自持节去，三生望江南——论宇文虚中 /64

- 一、自许能肥北海羊 /65
- 二、流落天涯俱是客 /69
- 三、是非留与后人传 /73

◎ 月旦须终定，阳秋岂易评——论方回 /78

- 一、桐江风雨 /78
- 二、“癸辛”事证 /82
- 三、忏悔与自辩 /88

◎ 在山为远志，出山为小草——论赵孟頫 /95

- 一、帝王苗裔 /95
- 二、十年隐居 /97
- 三、钧天一梦 /103
- 四、重叹出处 /108



◎ 佹得佹失，进退失据——论钱谦益 /113

- 一、宦海弄潮 /113
- 二、南都迎降 /116
- 三、遗老自居 /121
- 四、盖棺之后 /129



◎ 苦被人呼吴祭酒，自题圆石做诗人——论吴伟业 /134

- 一、晚明岁月 /134
- 二、甲申前后 /137
- 三、应诏出山 /140
- 四、那尉诗魂 /147
- 五、忏悔数应 /150



◎ 栖巢如茧，游戏人生——论龚鼎孳 /155

- 一、明季才子 /155
- 二、我原欲死 /158
- 三、横波夫人 /160
- 四、栖巢如茧 /164
- 五、自赎行为 /167



◎ 贰臣之评价 /173

- 一、道义与事功 /173
- 二、行“权”与作伪 /183



◎ 后记 /189

中
国
传
统
文
化
人
格





绪论：贰臣与中国的忏悔文学

随着纪实文学的兴盛，古代人物传记大量地涌现出来。帝王、后妃、宰相、名臣、宦官、奸佞、侠客、辩士、隐士、高僧、才子、名妓……，一时之间，历史上的各类人物，全都抖落岁月的风尘，复活了。

在中国古代历史上，还有这样一类人。他们处在王朝易代之时，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，他们没有以死殉国或殉自己的故君，也没有躲到山林里去做不食周粟的遗民，而是成了新朝的臣子。因为他们先后仕于两个王朝，所以被称为贰臣。臣事君犹女事夫，这是自秦汉以来就形成的习惯性譬喻。因此，再仕新朝的贰臣就如同再醮的女子，大节有亏，人格有污，即或情有可原，也为正人君子所不齿了。

当然，同样是贰臣，情形亦有千差万别。这里面最大的区别也许就是，一种人是贪生怕死、追名逐利的无耻之徒，而另一种人则是一时失足而本心不昧者。前一类人固然不足齿数，后一类人则历来颇受同情。我甚至认为，那些失节之后良心发现，自责自讼，真诚忏悔的贰臣们，他们所展示的人性的弱点，具有某种普遍意义，而在表现人性心理结构方面所达到的深度，也是其他类型的人物与作品所难以企及的。贰臣与忠烈相互形成对照，但它们同时又具有相辅相成的功能，同样可以引起后代人灵魂的战栗与道德自警，起到治疗人性弱点、净化人类心灵的作用。

我多年之前就对庾信感兴趣，后来因庾信而上及李陵，又先后读到赵孟頫、吴伟业等人的作品。我觉得像这样一类人，他们的行为、作品以及后人的评价，已经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。因为后代贰臣总喜欢以庾信自比，或者可称之为“庾信现象”。透过这种现象，不仅可以感受到中国一向崇尚伦



理道德的人文传统,华夷有别的民族意识,偏重气节的人格观念等等,而且可以看到人性中向上的自我完善的一面,与堕落苟且的一面错综交织的复杂性。因此,我之所以要选择这样一个研究课题,一方面当然也有填补贰臣研究之空白的小小野心,但更重要的是出于探究人性深远景观的好奇心。

中国历史上的贰臣很多。每当王朝交替之际,以身殉国的固然不乏其人,但再仕新朝的贰臣更是所在多有。因此,尽管二十四史中没有《贰臣传》,而贰臣的数目却是相当可观的。为了论述的方便,我不能不对研究范围稍加限制。就个案选择来说,我确定了以下三条原则:

第一,以南人仕北者为主体。这里所谓南北,不是就空间意义而言,而是指汉族士大夫再仕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。尽管各种辞书上解释贰臣,只说是前代大臣再仕于新朝者,并无其他规定性,然而我在研究过程中发现,如果同属于汉族王朝之间的权力交替,贰臣们所受到的舆论批评与心理压力是相当有限的;而身为汉族士大夫再仕于少数民族政权,却被看做人格、大节上不可原谅的污点。如果说贰臣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的话,那么南人仕北者就是狭义的贰臣,也是最有代表性的贰臣。方回诗中所谓“江淹犹匪恨,庾信始为愁”(《桐江续集》卷二十六《偶题》),就是这层意思。

第二,选文臣而不选武夫。选文臣,是因为这些人自幼饱读经书,深受儒家伦理文化的熏陶,在失节之后可能会良心发现,自责自讼,从而表现出人性心理结构的深度与复杂性。所谓良心,实际就是由伦理意识、道德观念、人格理想等等所积淀而成的价值体系。武夫们不能说没有道德观念,但一般来说比文人要淡薄得多。之所以选了一个武将李陵,那是因为前代人论及贰臣,往往首先想到他,同时也因为那一组后人假托的苏李赠答诗,使得李陵在后人心目中已经文人化了。事实上除了李陵之外,其余的人物不仅是文臣,而且都可以说是文学家。之所以如此,乃是因为他们都有较多的作品流传下来,为我们探讨其人格、心态、提供了可靠而充分的文献基础。

第三,注重人格的典型性。对于贰臣来说,他们的典型性就在于其人格心理往往表现出矛盾分裂的复杂状态,或者说在于他们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与内心之本我的不协调性质。这些人物大都具有两面性,在历史评价上往往有争议。一方面他们都是大节有亏的贰臣,但另一方面又在不同程度上进行自我忏悔与灵魂的自我救赎。这使你很难说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,而他们既不值得褒扬却又很难简单否定。我不愿选那些死心塌地地为虎作伥的无耻小

人,那是些觊觎事敌而毫不羞愧的无耻之徒。这一方面是因为我缺乏正面逼视丑恶的冷静与耐力,同时也是因为我认定这种没有思想也缺乏感情的人,浅薄得如同初级动物,因而没有分析的必要。

因为这是一项带有开拓性的研究,所以在资料搜集、人物遴选等方面具有较大的困难,更难的也许在于人格分析中的价值判断。在我来说,是把这些人物看做人性的标本,力图进行冷静的客观的分析,以达到疗治人性弱点的目的。但由于研究对象毕竟是人不是物,而在很多情况下,研究者必须设身处地,把自己置于特定的历史时空,以揣以摩,才能免去历史的隔膜之感。在这种体会角色的过程中,很可能不自觉地对笔下人物寄予较多的同情。同情不幸者或是原谅忏悔者,原是各种宗教教主的共同态度,同时也是人之常情。我当然不敢托尊做我佛慈悲模样,而是但凭情性之自然。

一、貳臣概念辨证

何谓貳臣?貳臣就是“王朝易代之际,兼仕两朝的大臣”。一般工具书皆作如是说。就此种概念的内涵而言,应该是自有朝代兴替,便有貳臣。譬如箕子、微子,都是由殷商而入于周朝的大臣。同时的貳臣应该还有很多,因为历代人都对伯夷、叔齐大加赞美,可见当时“不食周粟”的节义之士不是很多。至于三代以下,借才异代既是各朝开国之君的必然策略,貳臣们当然更是所在多有。如汉高祖的时候,当朝文武之所以多布衣之士,自然是多年的农民战争所造就的,同时也是因为秦朝的大臣在战乱与楚霸王的刀剑之下,没有几个能侥幸活下来。若是像西晋或北宋那样以禅代形式建立的新朝,差不多就是前朝的原班人马。总之,貳臣现象可以说是历史悠久也相当普遍的。

然而,貳臣概念却出现得很晚。

先秦诸子普遍涉足于政治哲学,对为君之道、为臣之道、君臣关系等等,发表过很多看法。但在诸子兴起的春秋、战国时代,士之出处或别仕他国,仿佛都是士子们个人的事,并没有太多的束缚或禁忌。即使是苏秦、张仪那样朝秦暮楚的人,也往往是在后代才受到道德、人格方面的指责。

诸子们也曾经试图建构为臣的道德规范。《荀子》中专列《臣道》一篇,把臣分为五种,即恣臣、篡臣、功臣、圣臣和社稷之臣。前两种是荀子所否定的,后三种是他肯定而倡导的。所谓“恣臣”,大致相当于后世的奸佞之臣,而“篡



臣”则相当于逆臣。又如《管子·七臣七主》篇，以能否奉公守法为标准，把臣分为七类，即乱臣、奸臣、愚臣、谄臣、侵臣、饰臣、法臣。他所肯定的实际只有“法臣”一种。其他如《墨子》、《韩非子》、《吕氏春秋》等等，也分别提出贪臣、经臣、妒臣、擅主之臣、诬能篡利之臣等等概念，彼此各立名目，具有较大的随意性。总之，没有人提出贰臣的说法来。

然而，作为对臣子们的正面要求，诸子们普遍强调臣事君要忠贞不二，则可以说已涉及与贰臣相应的伦理道德问题。《论语·八佾》篇载：定公问：“君使臣，臣事君，如之何？”孔子对曰：“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。”此犹是以君臣相对而言，对君对臣皆有所要求，并非单方面地要求臣下之忠。孟子在儒家学派中较为重视士人主体人格，故《孟子·离娄》篇说：“君之视臣如手足，则臣视君如腹心；君之视臣如犬马，则臣视君如国人；君之视臣如土芥，则臣视君如寇仇。”孟子强调君臣关系的相对性，实际是为士人（臣）保持自我独立人格留有余地。但在孟子的时代，君权已在不断膨胀，而士大夫的独立人格则相应萎缩。除孟子以外，更多的人对君主的无上权威表示认可，而反过来对臣下提出更为苛刻的要求，就是要无条件地忠于君主。如《庄子·人间世》借孔子之口说：“天下有大戒二：其一，命也；其二，义也。子之爱亲，命也，不可解于心。臣之事君，义也；无适而非君也，无所逃于天地之间。”托名管仲的《管子·形势解》亦云：“为臣下而不忠，为子妇而不孝”，是“人之大失也”。《吕氏春秋·恃君览》则借文王之口说：“父虽无道，子敢不事父乎？君虽不惠，臣敢不事君乎？”这就不再是孔子、孟子所谓君主如何，臣乃如何的思维逻辑，而是不论君主如何，臣都只有忠于君主的份了。此种伦理道德观念，既造就了历代君、国不分的愚忠，也为后来贰臣概念的产生提供了逻辑前提。

在诸子及同时的历史著作中，也有一些说法，已经在不同程度上接触到贰臣概念的实质了。如《国语·晋语四》：“事君不贰是谓臣。”反过来说，事君有贰则非臣，也就是后来意义的贰臣。又《国语·晋语九》：“委质为臣，无有二心。”《左传·庄公十四年》：“臣无二心，天之制也。”《韩非子·有度》：“贤者之为人臣，北面委质，无有二心。”更值得注意的是荀子论“忠”。他说：“有大忠者，有次忠者，有下忠者，有国贼者。以德覆君而化之，大忠也。以德调君而补之，次忠也。以是谏非而怒之，下忠也。不恤君之荣辱，不恤国之臧否，偷合苟容，以之持禄养交而已耳，国贼也。”荀子论析任何命题，都比前代诸子更加深入细致。一个“忠”字，他又析为三等，并各加阐发以实之。三等

之下，则称“国贼”。他之所谓“国贼”，也许只是就尸位窃禄的意义而言，并无卖国之意，但从这里也可看出，在荀子看来，臣对君若无忠心可言，便已称不得臣了。

为什么贰臣现象肇自上古，而贰臣概念却渺不可期？由上述诸子的论述可以推知一二。贰臣之“臣”，乃与“君”相对，臣可以多多，而君主却只有一个，因此，也许前人根本没想到一臣而事二君的可能性，此其一。又贰臣之“贰”，实与“忠”相对，“事君不贰是谓臣”，事君有贰则非臣；既已非臣，哪里还会想到去杜撰一个“贰臣”名目来强为之名？此其二。从这两点来看，贰臣概念之晚起也是可以理解的了。

“贰臣”作为一个专有名词，究竟起于何代，自然还有待于进一步查考，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文献出处，是距今不过二百余年的乾隆年间所编的《贰臣传》。

乾隆四十一年（1776）二月，清高宗下诏于国史内增立《贰臣传》。此事起因于乾隆三十四年，清高宗于钱谦益文集中发现许多“诋谤”满清之处。钱谦益本是由明降清之贰臣，却敢于在文集中攻击当朝，这使得清高宗大为震怒，并由钱谦益联系到其他贰臣，遂形成增立《贰臣传》之动机。清高宗在诏书中特别提到：“钱谦益反侧贪鄙，尤宜据事直书，以示传信。”可见数年前的那件事确实是促成这一动议的契机。两年之后，即四十三年二月，估计《贰臣传》已经成稿，清高宗又下诏说：

“钱谦益素行不端，及明祚既移，率先归命，乃敢于诗文阴行诋谤，是为进退无据，非复人类。若与洪承畴等同列《贰臣传》，不示差等，又何以昭彰瘅？钱谦益应列入乙编，俾斧钺凛然，合于《春秋》之义焉。”（《清史列传·贰臣传乙·钱谦益传》）由此可见，《贰臣传》已不只是清高宗所敕编，而直可以说他是名



乾隆皇帝



副其实的主编。因为在此以前的“二十四史”中都没有《贰臣传》，所以也可以视为这位“十全天子”的又一大发明。

二、贰臣与华夷之辨

如前所说，贰臣概念的一般内涵，是指王朝易代之际兼仕两朝的大臣。这个说法当然不能算错，但是从中国的人文传统来说，似乎并未道出这个概念的深层内涵。

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，历史上的贰臣数不胜数，而遭人诟病的往往只是少数人，而这少数人又集中于三个历史时空。一是南北朝，二是宋与金元，三是明清之际。这三个时期，或是汉族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同时而南北对峙，或是在北的少数民族政权以武力手段入主中原，总之都是民族矛盾冲突趋于激化的时候。然后再看那些受讥评较多的贰臣，如由萧梁而再仕北周的庾信，由南宋而再仕于金的施宜生，由宋宗室而再仕于元的赵孟頫，和由明入清的钱谦益、吴伟业、龚鼎孳等等，就会发现，他们全都是由汉族政权而再仕于少数民族政权者。同样是先后兼仕两朝，如果这两朝都是汉族政权，譬如说是南朝宋、齐、梁、陈前后相承，那么这种贰臣在人格上尽管可以说不无污点，但是并不会引起多少公愤与指责。而再仕于少数民族政权的人就不止是仕于两朝，而直是仕于“异类”，是有失民族尊严的奇耻大辱，从道德人格来说也是

是绝不可以原谅的了。据此可以说，“贰臣”概念的深层内涵，是特指那些再仕于少数民族政权的人。而之所以如此，乃是因为在中国人文传统中，以“华夷之辨”为核心命题的民族意识在起作用。

“华夷之辨”是一种相当古老的民族意识。《左传·定公十年》所谓“裔不谋夏，夷不乱华”，《闵公元年》谓“戎狄豺狼，不可厌也；诸夏亲昵，不可弃也”，都是以华夏与夷狄相对称。又《春秋公羊传·僖公四年》有“南夷与北狄交，中国不绝如线”之语，表明当时华夏与四夷的矛盾已相当突出。正是在这种情



管仲

况下，“尊王攘夷”成为当时有识之士的共同主张，同时也成为评价前代人物功过的重要方面。例如，身为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，在取得君位之后，为了巩固自己的位置，便兴兵伐鲁，逼迫鲁国杀了他的哥哥公子纠。管仲和召忽原来都是公子纠的师傅，公子纠被杀，召忽自杀以殉，管仲却做了桓公的宰相。从仁义道德的角度来说，齐桓公与管仲都有污点。但是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，尊周室，攘夷狄，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，于是孔子称道“齐桓公正而不谲”，又曰：“管仲相桓公，霸诸侯，一匡天下，民到于今受其赐。微管仲，吾其被发左衽矣。”（《论语·宪问》）“被发左衽”，即披散着头发，衣襟向左边开，是当时周边落后民族的装束。由孔子对齐桓公和管仲的评价可以看出，“华夷之辨”的民族意识，远比其他人格上的是非来得重要。

孔子之后，“华夷之辨”就被视为“春秋大义”，从此成为儒家思想体系乃至中国人文传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

南北朝以来，随着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建立，对中原或南方汉族政权的威胁日益严重，“华夷之辨”尤其成为文化观念上不断论争的题目。这种论争，在南方的汉族士人来说，表现为对本民族文化的优越感，以及对北方少数民族的拒斥心态。《南齐书》立《魏虏传》，以“虏”称北魏之鲜卑，而且开头即称为“匈奴种也”。丘迟《与陈伯之书》中亦云：“故知霜露所均，不育异类；姬汉旧邦，无取杂种。”这些已不只是自尊自豪，而且带有大汉族沙文主义的意味了。对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来说，他们也并不回避这一带有挑战性的命题，而是借用《孟子·滕文公》中提出的“用夏变夷”理论，努力泯去民族之别，强调自己已经汉化，因此同样可以成为中原之主。

杨衒之《洛阳伽蓝记》卷二《景宁寺》中记载，梁武帝派陈庆之使魏，魏臣设宴招待他。席间，陈庆之趁醉说：“魏朝甚盛，犹曰‘五胡’；正朔之承，当在江左。”正朔，原指帝王所颁之历法。因改朝换代，新王朝表示“应天承运”，须重定正朔，故此处亦犹言正统。陈庆之说，北魏作为少数民族（鲜卑）建立的政权，无论多么兴盛，也改变不了非正统地位。他之所以如此说，显然是以“华夷之辨”为前提的。但在北朝臣僚们看来，“华夷之辨”并不意味着华优夷劣，即使历史上如此，也未必永远如此，能否成为正统，关键在于以礼乐教化为核心的文化水平的高低。崔浩等人所提出的“能行中国之道，则中国之主”的说法，也许本来只是作为一种“以夏变夷”的策略性口号，但事实上却为北魏以后各少数民族政权的入主中原，提供了理论前提。承上所述，当陈庆之



发表完他以华夷之辨论正朔所在的观点以后，北魏之臣杨无慎立即予以反驳，先言梁朝僻居江左，为楚越旧地，犹存断发文身之陋习，故就礼乐教化而言，亦算不得正朔所在。继言北魏“移风易俗”，“礼乐宪章”大盛，即是说他们已经“用夏变夷”，故为正朔而非闰位。

自南北朝以至于近代，“华夷之辨”的论争持续了千有余年。但是在民族矛盾尖锐冲突的情况下，这种论争显然不是客观的学术探讨，而只能是民族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。因此，南北双方不仅不可能取得共识，而且在事实上强化了民族之间的裂痕。即如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和满族建立的清朝而言，在这两个王朝的统治者看来，正是“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”的成功范例，已足以证明“华夷之辨”或“华夷优劣论”的破产；但在汉族士大夫们看来，“异族”人主中原，并非正统之承续，而只是“神州陆沉”，一场民族劫难而已。

宋元之际的贰臣方回有两句诗：“江淹犹匪恨，庾信始为愁”，个中意蕴，是很耐人寻味的。江淹初仕于南朝之刘宋，后再仕于齐，又仕于梁，前后历仕三朝。庾信则是由梁朝出使西魏被留，因为西魏旋即为北周所取代，他可以说是先后仕于梁与北周两朝。同为贰臣，为什么说“江淹犹匪恨，庾信始为愁”呢？问题在于，江淹虽然历仕三朝，却同属汉族政权，其人格虽然不无瑕疵，却又似乎未足深病；而庾信虽然仅仕于两朝，却跨越了华夷之畛域，这就是大德问题，而大德是不可“逾闲”的。由宋入元和由明入清的贰臣们，往往自比庾信而未敢攀附江淹，因为他们心里明白，虽然同是贰臣，其性质却是不同的。

国家、民族都是一些历史的概念，“华夷之辨”同样也是古代历史环境下的产物。现代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友好团结的统一的国家，而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也同属于中华民族。立足于现代去观照历史，我们会觉得由“华夷之辨”所体现出来的民族意识不免狭隘而拘执。然而我们又不能不承认，正是这种民族意识构成了历史上爱国主义的思想基石。如苏武、岳飞、文天祥、史可法、张苍水等爱国英雄，他们的民族气节正是植根于华夷异类的民族意识上的。而像庾信、赵孟頫、吴伟业等南人仕北的贰臣，之所以比江淹那样的贰臣受到更多的讥评，或者在良心上受到更大痛苦的折磨，也和这种“夷夏之大防”的观念有着必然联系。

三、贰臣人格的两重性

同为贰臣，其人格当然也有千差万别，但作为人类中一个特殊的“种群”，他们的人格型态也具有某种统一性。其中最主要的特征，就是贰臣人格的两重性。

所谓两重性，主要有以下三种表现方式。

（一）前后割裂

前后割裂就是俗语所谓“两截人”。人之一生，前后行事截然不同，几乎判若两人者，本来不独贰臣，在历史或现实中都不乏其例。但在生活中是或然，在贰臣是必然；在其他人为渐变，在贰臣则为突变，所以成为贰臣人格的一个基本特征。其所以为突变，当然不是人格生发之自然，而是起因于突然的外力压迫。或者因为民族之间战乱的爆发，或因为生值沧桑易代之际。至于那些出使被留的情况，往往也和战乱环境有关。又所谓两截人生，中间必有一道界线分隔。或由南朝入北朝，或由胜国入新朝。人还是原来那个人，有的甚至官职都没变，但是国号变了，君主变了，服色变了，正朔变了。对于一个有良心的人来说，最大的变化也许是，他的心已经死了，而那个仍然出入朝班和不得已的社交场合，感情麻木、反应机械、倦于一切又敷衍一切的人，只不过是一个没有自由意志、没有人格、甚至没有灵魂的躯壳而已。为了适应这种变化，或者是为了记住这个前后分界的日子，许多人把自己的字号、书斋名称、文集名等等，也都改了，仿佛原先那个人已经死去似的。如方回入元以前的作品编为《桐江集》，入元以后的编为《桐江续集》；钱谦益在明朝时的别集为《初学集》，降清以后的编为《有学集》；吴伟业《梅村家藏稿》的前集、后集之分，也是以再仕清廷为界限的。

试看几个具体例子。

宇文虚中，于宋高宗建炎二年（1128）为祈请使出使金国。所谓“祈请使”，使命就是祈请宋徽宗、宋钦宗二帝还国。对金朝来说，他们正想利用这两个被俘虏的皇帝要挟南宋，当然不可能放他们回去；岂但不放徽、钦二帝，因为他们爱重宇文虚中的文名，就干脆连使节一块羁縻而不遣了。宇文虚中那年刚好 50 岁。他自 30 岁登进士第，为官 20 载，颇以直节著称。出使金国



是他自动请行的,而且他也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。其《在金日作》诗云:

遥夜沉沉满幕霜,有时归梦到家乡。

传闻已筑西河馆,自许能肥北海羊。

回首两朝俱草莽,驰心万里绝农桑。

人生一死浑闲事,裂眦穿胸不汝忘。

这首诗就是他初到金国时的作品。“除馆”本意为修治馆舍,这里用作拘禁的隐语。下句“自许能肥北海羊”,则显然是以杖汉节牧羊北海的苏武自比。又末联更以死为闲事,发誓不辱使命,激昂慷慨,足以令人感动。然而,宇文虚中被留不久,就做了金朝的翰林学士,与韩昉同掌词命了。虽然《行状》中说他曾有“效奇功,报本朝”的想法,恐怕也只是聊以自慰而已。宇文虚中后来所作诗《和高子文秋兴二首》其一云:“羞看使者节,甘荷牧人蓑,”表现了他的羞愧心理与隐遁以终的想法,由此可知他已自认为贰臣了。

又如赵孟頫。他本是宋宗室子弟,宋太祖赵匡胤十一世孙。南宋灭亡以后,他曾和钱选等人结为“吴兴八骏”,立志隐居不出。《松雪斋集》中《古风十首》、《咏怀六首》、《咏逸民十一首》等组诗,都是他隐居时期的作品,其中充满了对古代逸民志士高山仰止的情怀,还有以气节自励自守的人格精神。《古风十首》其二有“朝为刻骨仇,暮作敌血亲”之句,对战国时张仪、苏秦一类士人的行径给予辛辣的嘲讽,同时也许还有借古讽今、鞭挞降元贰臣的创作动机。然而,当元朝的集贤学士程钜夫到江南访求遗佚人才时,赵孟頫却一征而起,随即北上入京,并且很快成为元世祖忽必烈所青睐的御用文人了。他不是赵宋王朝的嫡系子孙吗?忽必烈不正是覆其家国宗庙而不共戴天的仇人吗?他那“朝为刻骨仇,暮作敌血亲”的诗句,岂不成了尖锐的自我嘲讽吗?

其他由宋入元的文士们也表现出类似的行为轨迹,只不过由于变化的时日较久,不是那么锐折急转而已。陆文圭《墙东类稿》卷六《送张菊存〔仲实〕序》中记载,宋亡以后,他与张菊存皆隐居不出。“暇日,命奚奴负诗囊,并辔游南北两山,穷泉源,坐石上联句,掘野笋而煮之,日晏忘归,时事一不挂口。”如此人物,俨然隐者形象。可是没过几年,陆文圭便听说张菊存因“经明行修,诸生迎入学师事之。省台贵人,藉藉道仲实名字”。陆文圭当然毫无讽刺之意,因为他知道张菊存出仕的根本原因是“家贫亲老,将为禄仕计耳”。但是从他对于张菊存前后形象的描述来看,仍然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嘲讽意味。

在戴表元《剡源戴先生文集》中,可以看到很多像张菊存那样隐而复出的